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

总主编：仲伟合 何刚强

简明中西翻译史

谢天振 何绍斌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

总主编：仲伟合 何刚强

简明中西翻译史

谢天振 何绍斌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中西翻译史 / 谢天振, 何绍斌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10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 / 仲伟合, 何刚强主编

ISBN 978-7-5135-3650-9

I. ①简… II. ①谢… ②何…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中国、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05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3607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屈海燕
责任编辑 屈海燕
封面设计 张 峰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3650-9
定 价 29.80 元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36500001

前言

翻译专业正式进入我国高等院校的本科专业目录后，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外语院系学科建设的一个新增长点，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相应的，翻译史的研究与教学也已经引起国内翻译教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一个学科，尤其是一门新兴学科的确立，离不开三个最基本的“支撑点”——学科史、学科理论和学科批评。对翻译学科来说，也即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由此可见，翻译史课的设置及相关教学对翻译专业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至关重要。

回顾最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在翻译史的研究领域，尤其是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类著作的编撰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少业绩和成果的，出版的著作总数已经超过了七十本，堪称硕果累累。但就翻译史的编撰而言，除马祖毅等著的《中国翻译通史》（五卷本）、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而外，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就为数不多了。至于专供教学用的翻译史教材，那就更乏善可陈，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外研社推出的MTI翻译系列中的《中西翻译简史》（谢天振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著）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郭延礼著）。这也许跟翻译这个专业的特殊性有关，这个专业特别注重实践，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对学生的翻译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少出版社都把眼光瞄准了跟口笔译技能训练相关的教材，诸如《英汉口译

教程》、《英汉笔译教程》等，而甚少关注甚至忽视翻译史教材的建设。然而，就像中文系的学生除了学习中文写作以外，必然还要学习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等课程一样，翻译系（而不再是外语系）的学生，如果没有翻译史、翻译理论等课程的学习和训练，那么他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同样是不完整的。这样的本科毕业生，其专业素质和学识修养与一般的翻译培训班的结业生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

不要以为翻译史课仅仅就是向学生流水账似的梳理一下历史上的翻译事件和翻译人物，翻译史课教给学生的远不止这些。

首先，翻译史课可以让学生全面了解翻译专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翻译史课向学生非常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翻译这门古老职业的发展历程，从而增强了学生的专业自豪感。然而，尽管翻译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翻译的两大基本类型，即口译和笔译，它们的基本形式、方法、手段等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口译基本上总是由译员在现场完成；而笔译则由译员独自一人或数人分工合作，进行外文与本族语之间的相互转换并形成书面文字。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口译从原先单一的交替传译发展出了新的口译形式——同声传译，而笔译则从原先单一的纸上笔耕进入到了电脑写作时代。这里的电脑写作不仅是指从纸上笔耕改为在电脑的键盘上打字，更重要的是指翻译时还借用了互联网和机器辅助翻译软件等现代化翻译手段和设施，从而可以实现异地同时进行合作翻译，大大提高了翻译的速度和效率。更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使口译的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远距离的、译者不在场的口译服务也已成为可能。

其次，翻译史课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人类的翻译理念是如何产生、演变、发展的，这对于当前翻译专业的学生而言尤其重要。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已经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翻译的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对中西翻译史认真深入的梳理，我们发现人类翻译观念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主流翻译对象密切相关。目前仍在国内翻译界占据着主宰地位的一些翻译理念，实际上是在中西翻译史的第一阶段（以宗教典籍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阶段）和第二阶段（以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阶段）形成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翻译史的第三阶段，即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阶段。我们的翻译活动需要负责的不光是原作文本，还有“客户”和“市场”，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光是“忠实（原文）与否”，还有“（是否有利于）传播、接受与影响”，还有“功能”与“效果”等。如果还以翻译

史第二阶段的理论来简单硬套第三阶段的翻译行为和实践,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后,通过翻译史的教学还可以让学生更清楚当前国内外的翻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也可以更加明确自己选择翻译作为专业方向肩负着什么样的职业重任和历史使命。在翻译进入了职业化时代的今天,每个翻译专业的学生不光是掌握必要的外语能力、翻译能力就足够了,还应该了解翻译这个行业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伦理守则,更应该懂得翻译不仅仅限于完成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一个负责任的翻译工作者应该把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有效交际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

为配合翻译史的本科教学,我们编写了这本《简明中西翻译史》,旨在为学生提供一条简洁清晰的中西翻译史的发展脉络,通过对这条脉络的描述带出中西翻译史上的历史时间节点,带出中西翻译史上最主要的事件、组织机构以及最主要的翻译家及其代表性思想。因此,本教材的整体结构是这样设计的:第一章先概述中西方古代的翻译活动,第二、三章集中描述中国汉代至明初的翻译活动。因为明代后期开始有较多西方传教士入华,西方世界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所以第四章转入对西方翻译活动的描述——集中介绍西方的圣经翻译,并勾勒出一条比较完整的圣经翻译脉络,从古罗马直至近现代。相应的,第五章着重介绍西方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包括圣经翻译,也包括世俗文献的翻译,以及参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中方翻译人士的情况。第六章介绍西方翻译活动中的另一条线索——西方中世纪的世俗翻译活动。第七章至第十章这四章则交替讲述中国和西方在19世纪和20世纪各自的翻译活动,但对中国翻译活动的描述止于20世纪上半叶,从而为第十一章专讲新中国成立后也即20世纪后半叶的翻译活动留下余地。

就具体内容而言,本教材着重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的介绍。前者主要是指特定翻译活动所处历史阶段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后者则强调特定历史时期对翻译产生或隐或显影响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体系等因素。表面看上去,翻译似乎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独立的环境中进行的,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笔译给人的感觉尤甚。其实不然,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语境都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譬如,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帝王对佛教的好恶就直接决定了佛经翻译的兴衰;而在西方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或是为了争夺对圣经的解释权,或是为了张扬民族语言的地位,同样对圣经翻译的方式、方法、策略甚至走向具有

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二是对中西翻译史上重要翻译家及其翻译思想的介绍。事实上一部翻译史主要也就是由翻译历史事件和翻译家这两大块内容构成的。如果说前者为翻译史这幅巨大的历史图画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色彩，那么翻译家就是这幅画中的主人公。通过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要翻译家及其翻译思想的描述，翻译史的发展脉络也就显得更加具体和清晰。考虑到本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是翻译专业的本科生，所以本教材在介绍翻译家时作了一定的取舍，尽可能集中在最主要的、最具代表性的翻译家上。与此同时，在介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观点、主张时，也以介绍描述为主，甚少展开评论。

第三也是本教材的一个特色，即在每一章的结尾处我们都安排了一个“小结与讨论”，以非常简洁的文字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归纳，指出该章的重点。与此同时，我们在“小结与讨论”里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对相关章节里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进行探讨。如上所述，我们在介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时尽量不展开编著者自己的主观意见，以让读者直接接触和面对历史事实和客观思想，但在“小结与讨论”这一节里，我们的“引导”背后多少也折射出我们编著者的立场。我们无意把这个立场强加给读者，而是希望为读者就相关问题展开思考和讨论时提供一个初始话题和切入点。

谢天振

2013年8月

目 录

▮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翻译活动	1
▮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	10
▮ 第三章	中国自汉迄明初的世俗翻译	33
▮ 第四章	西方的圣经翻译	49
▮ 第五章	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翻译	67
▮ 第六章	西方中世纪的世俗翻译活动	87
▮ 第七章	中国 19 世纪的翻译活动	99
▮ 第八章	西方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的翻译活动	120
▮ 第九章	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翻译活动	141
▮ 第十章	西方 20 世纪的翻译活动	166
▮ 第十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翻译活动	180
▮ 推荐书目		208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翻译活动

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样久远。中国先秦时代就有翻译活动的记载，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上几种不同的文字，《圣经》中关于巴别塔（亦称通天塔）的传说，也都是上古时期不同语言间交际和翻译活动的印记。可以想象，人类先民尽管活动范围有限，但部落之间的偶然交往不可避免，口译活动，确切地说是早期的跨语言交际，也因此必不可少。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交往日益频繁，翻译活动也日显重要。一般说来，口译活动总是先于笔译活动，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字的出现比较晚，另一方面只有社会组织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才需要书面文件的翻译。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关于人类早期翻译活动的记载都十分稀少，今天我们只能从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和考古发现的零星物件中窥探远古时代人类的翻译活动。

1

第一节 中国汉代以前的翻译活动

中国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汉译。至于汉代以前的翻译活动，史书记载很少，有些还是后人补记的。

古籍中关于翻译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一部叙述当时官制的书《周礼》¹，其中《秋官》篇中提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这里的“象胥”即指周代负责接待周边少数民族或邻国使节并担任口译的官员。根据《周礼》的说法，象胥之上还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他们的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比象胥职位低的还有上士、中士、下士和徒等，

1 《周礼》据说为西周时期周公旦（姬旦）所作，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

约 31 人，¹可见这个机构规模不小。《礼记·王制》中有一段话充分反映了当时周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及彼此之间翻译活动的概况：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可见周王朝史官自称“中国”，而把位于“中国”四周的其他民族分别称为夷、蛮、戎、狄，故而称“五方”。“中国”人与东南西北各民族的语言不同，为了相互交流，出现了专门翻译（主要指口译）各周边民族语言的人，翻译东方语言的人称“寄”，翻译南方语言的人称“象”，翻译西方语言的人称“狄鞮”，翻译北方语言的人称“译”。这些早期对译者的称谓一直流传下来，直到近代，人们谈论翻译人才时，还习惯称呼他们为“象寄之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籍中最初并无“翻译”一词，首先出现的是“译”字，直到佛经翻译时代，才逐渐与“翻”字连用。而且从《礼记》看，“译”字最初指担任翻译工作的人或职位，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一个动词。唐代学者孔颖达在为《礼记正义》所作的疏解中解释说：“其通传北方语言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对“译”字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而另一位唐代学者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对“译”字的解释是“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给出了一个即使从今天的译学眼光来看也堪称经典的翻译定义。

周代对译者的称谓，除了上述象胥、象、寄、狄鞮和译外，还统称“舌人”。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也偶尔涉及翻译活动，“夫戎狄冒没轻儻（音 chán），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比之《礼记》，《国语》对“中国”之外的民族轻慢之态溢于言表，甚至称之为“禽兽”；戎狄来朝贡，正式见面前只有“舌人”来接待、敷衍。据三国时期吴人韦昭的解释，“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²“舌人”多指民间普通口译人员，而“象胥”是官方任命的正式译员。

中国古籍中关于翻译活动的只言片语还告诉我们，当时翻译多为外事口译。北宋时编纂的《册府元龟》把周代至北宋的外事活动按功能分为 9 类：册封、朝贡、和亲、通好、盟誓、纳贡、入觐、请求和互市，几乎每一类活

1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2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 页。

动都与翻译相关。《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等语，“于夷”和“方夷”等很明显是“中国”之外的民族，他们来朝贺中原君主即位，自然少不了翻译活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有这样的记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越裳国使者经过三次辗转翻译才得以和周公交流，这也许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外事口译活动了。

古籍中记载的绝大部分外事活动都是外族或外国人来中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箕子碑》则记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进行翻译活动的例子。相传箕子本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封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世称箕子。箕子非常贤明，常常劝谏纣王施行仁政，纣王不但不听从，还把箕子囚禁起来。周灭商后，周武王将箕子释放，但他不愿仕周，逃亡到朝鲜，武王就将朝鲜分封给他。《箕子碑》里说他“及封朝鲜，推道训俗……俾夷为华，化及民也”。朝鲜史书《东国通鉴》的记载则印证了柳宗元的说法：“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既至朝鲜，言语不同，译而知之”。¹可见箕子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对外交流使者，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留名青史的翻译者。此外，《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等古书说周穆王西行至今中亚一带，西王母献歌一曲来欢迎，这些富于想象的传说当然不足为信，但也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人对外交流的愿望。张骞出使西域则是信史，他曾到达中亚多国。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中，首要的就是翻译，否则任何交流都谈不上，遗憾的是史书对此惜墨如金，甚至只字未提。

除了外事口译，还有少量文学翻译。西汉刘向所编《说苑》之《善说》篇记载了楚国大夫庄辛讲述的一个故事：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君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在盛会上，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就是著名的《越人歌》，原文还有用汉语记录的越音，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翻译诗歌。²

先秦以来的文献中的确有一些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但总体上记载既少又不详细，往往散落在史书中关于外交事务的篇章里，如《外臣部》、《蛮夷传》等。正史里胪列的相关资料多为翻译职官或朝贡表文，对具体传译过程鲜有提及，而译者的姓名几乎从未被提及。这些情况反映了古人对翻译问题的轻视态度。《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称译者（口译者）为“舌人”，称外族或外国语言为“反舌”，东汉高诱注释《吕氏春秋》说“夷语与中国相反，

1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2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故曰反舌”，其轻慢之状跃然纸上。据说孔子也曾发表过关于翻译的言论，他和鲁哀公的对话中，称“翻译”为“小辩”，是国君不必亲力亲为的“小道”；至于外交事务，让译者来传言即可，非常简单，“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¹唐代大诗人刘禹锡（772-842年）在《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中写道：“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他所说的“翻译徒”可能指的是佛经译者，佛经翻译中一直有文、质两派，而担任佛经汉译者多为僧人，其文化水平当然不可能与大诗人相提并论。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东晋大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可称得上“文雅雄”了，他就参与过佛经汉译，流传至今的《大般涅槃经》卷首标明“谢灵运再治”，抚州宝应寺也曾保留“谢灵运翻经台”古迹，只是历代文学史家对谢灵运的翻译家身份从来都视若无睹。²这些例子都说明，古人对翻译或译者的轻视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节 西方早期的翻译活动

西方关于翻译的起源充满了神秘色彩。《圣经·旧约·创世纪》有一个故事：远古时代，人类操同样的语言，使用同样的词语。在向东迁徙过程中，他们来到一片平原，决定在那里定居。同时，人们商量建一座城，在城中造一座高塔，可以直达云霄。耶和华（上帝）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所造的塔很快就要到达天庭，于是决定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人们彼此语言不同，无法再齐心协力干一件事，从此人们四散各方。这座城市叫巴别（Babel），城里的塔叫巴别塔（Tower of Babel）。后世学者多借巴别塔的故事喻示翻译的起源及其与语言的关系。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则受惠于古埃及和近东地区的灿烂文化，其中翻译无疑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的最主要手段。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人完成了“象形文字”的创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创制了一种“楔形文字”，由此可见这些地方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希腊人借地利之便（靠近小亚细亚），从古巴比伦人那里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从犹太人那里学习了神学，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建筑术，“这些文明成果通过翻译媒介教化了整个欧洲”。³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对这些翻译活动的情况却鲜有文字记载。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转引自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02页。

3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西方真正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始于《圣经·旧约》的希腊语翻译。《旧约》本是犹太教经典，主要用希伯来语写成（个别章节用阿拉米语写成），后来被基督教全盘接受。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命运多舛，常常被异族征服，被迫迁徙，四处流散。其中一部分希伯来人流落到埃及，聚居在亚历山大里亚。到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已经不会讲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而只会讲希腊语。为满足犹太社区的宗教需要，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菲请求耶路撒冷大主教艾利扎派遣懂希腊语的学者将《旧约》翻译成希腊语。据说艾利扎从12个以色列部落中各挑选6名学者到亚历山大里亚去翻译，这72名学者两人一组，分别在36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翻译，结果译文几乎完全一样。在英语世界，这个希腊语译文的《旧约》被称为 *Septuagint*（这个词源自拉丁文 *Interpretatio septuaginta virorum*，意思是“七十人的翻译”），汉语世界称之为《七十子文本》（亦称《七十贤士译本》或《七十子希腊文本》）。¹ 有意思的是，尽管基督教会历来声称72位学者的翻译结果一致，而且十分准确，事实上学者们的译文彼此差异极大，充斥着原文（希伯来语）的词汇与句法，是很糟糕的翻译。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七十子文本》的权威性，直到当代许多希腊教会还在使用这个版本，它还是地中海沿岸其他语言翻译《旧约》的底本。²

古希腊孕育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最终还是被崛起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军事强国罗马征服，西方第一个翻译高潮也随之而来。罗马人在军事上十分强大，文化上却远逊于希腊，因此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人就开始大量翻译希腊典籍，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公元前204年）是罗马早期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奠基人。安德罗尼柯本是希腊人，后被罗马军队俘虏并卖为奴隶，主人欣赏他的才华而给了他自由。获得自由后，他在罗马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为生，为了教学方便他进行了大量翻译。约公元前250年左右，他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文采用的是撒图尼乌斯诗歌体，翻译方法是尽量使用罗马化的拼写，如将希腊神祇宙斯译成罗马人熟悉的朱庇特，将希腊文的赫尔墨斯译成罗马人的信使墨丘利，将缪斯换成卡墨拉，等等。用当代的术语说，他使用的是归化翻译法。安德罗尼柯翻译的《奥德赛》本身文学性并不强，然而这是第一部用拉丁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首拉丁诗，其文化移植的方法不仅丰富了罗马文化，也是后代翻译家和文学家们学习的样板，影响十分深远。此外，安德罗尼柯还翻译和改编过希腊的戏剧作品，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页。

2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in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Pinter, 1990, pp14-28.

人的悲剧和米南德的喜剧。他编译的部分剧本被搬上一年一度的“罗马赛会”舞台，催生了罗马的舞台表演艺术。

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 公元前 270-公元前 201 年）是古罗马另一位翻译家和历史剧作家。他一生翻译创作了 6 部悲剧和 30 部喜剧。与安德罗尼柯的模仿式翻译不同，涅维乌斯常常把几出希腊喜剧组合起来，保留希腊戏剧的形式，内容却充满罗马特色，是一种混合戏剧。

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 公元前 239-公元前 169 年）被誉为“罗马文学之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以创作《编年史》著称，但他翻译过希腊悲剧，并通过翻译把希腊的六步韵移植到拉丁文学中，对拉丁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了上述三位著名翻译家，古罗马著名的翻译家还有普劳图斯（Plautus, 公元前 254-公元前 184 年）、泰伦斯（Terence, 公元前 190-公元前 159 年）、卡图卢斯（Catullus, 公元前 84-公元前 54 年）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年）等，他们都或多或少翻译过希腊的史诗和戏剧。

古罗马人不仅掀起了西方第一个文学翻译高潮，同时也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总结者。西塞罗不仅翻译过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色诺芬的《经济论》等文学和社科作品，还是第一位翻译理论家。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恶之定义》两部著作中他对翻译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声称自己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提出翻译中没有必要字字对应，只需要保留原文总的风格和力量即可。换言之，他反对字字对应的机械直译，赞成灵活的译法。他还主张翻译也是文学创作，应使用符合罗马语言习惯的语体翻译外来作品，以吸引读者。西塞罗讨论过的问题如翻译与创作、内容与形式、译者的职责与权力、“解说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等，是此后将近 2000 年里西方翻译理论探讨的主要话题。¹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公元前 8 年，英语拼写为 Horace）是古罗马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和翻译理论家。在其名著《诗艺》中他提出：翻译和创作一样贵在创新，翻译家有权利去创造罗马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译文应该忠实，但不是简单忠于原文文本，而是要以目的语读者为尺度。² 他明确反对逐字对应式的翻译法，主张灵活的意义转换。³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35-95 年）是一位修辞学家，也对翻译问题有独到见解。他在《修辞学原理》中提出：翻译可根据内容分为一般材料翻译和创造性的翻译，前者如商业文本，后者如文学、哲学文本；他还提出应该区分“翻译”和“释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0-21 页。

2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82 页

3 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5.

义”，后者不仅适用于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也适用于拉丁语语内的解释和模仿；通过翻译，译者可以锤炼写作风格，可以与原文竞争，与原作媲美，因为翻译也是一种创作。¹

第三节 中东²地区早期的翻译活动

由于地缘、更由于文化上的渊源，中东地区与希腊、罗马的关系往往“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许多史书，尤其是翻译史常常将中东的历史放在“西方”的框架下叙述。我们认为，尽管中东与“西方”关系密切，但它毕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性，因此单列一节。

正如第二节所谈到的，某种程度上，希腊文明源自近东和中东，这些地区很早就有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很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古亚述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是此区域的杰出代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就兴起了一个亚述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该国国王供养了一大批精通数种语言的“书吏”，他们的任务是用各种语言把国王的丰功伟绩公诸于世，这也许是中东地区最早的翻译活动了。公元前19世纪，阿摩利人灭掉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了以巴比伦城为首都的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世纪初，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即位，征服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西亚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典型。汉穆拉比国王颁布了人类第一部成文法《汉穆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内容用楔形文字镌刻在黑色石柱上。由于古巴比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法典使用的是阿卡德语，国王命令译员把法典内容翻译给不同民族的人听，同时还要他们负责把其他政令翻译成各种文字，以传达给城邦庶民知晓。与此同时，另有一些译员还专门编辑了不同语言的词汇表，以方便翻译对照，类似于今天的双语或多语词典，由此可见当时的翻译活动是何等频繁。

《圣经·旧约》中的一些描述也反映了古代中东地区的一些翻译概况。《旧约·以斯帖记》第8章第9节说：“三月，就是西弯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太人和总督省长

1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 19世纪末，西方部分地缘政治学者、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为区分西欧以东的国家和地区，炮制了一些关于东方的术语，包括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

首领。”¹ 国王的书记很显然是精通多种语言的人，他们能将国王的法令翻译成不同语言。《旧约·尼希米记》也有类似记载。尼希米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末），人们常常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广场上听人宣讲神的律法，有些听众听不懂，于是有一些人帮助翻译，“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² 为什么部分老百姓听不懂宣讲？因为“上帝的律法”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而听讲的听众来自四面八方，那些来自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如埃及、巴比伦等地，他们早已忘记了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所以只好请译员用当时闪米特人做生意的通用语阿拉米语来解释。³ 圣经翻译史上《七十子文本》的产生，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是中东地区古代翻译活动的又一历史见证。1799年拿破仑率法国大军远征埃及，士兵们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镇发现了一块镌刻着多种古文字的石碑。据研究，这块碑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从上到下分别铭刻着三种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字和希腊文。经后世学者解读，石碑文字内容为埃及祭司们记录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丰功伟绩及一系列教令。罗塞塔石碑留给后世的悬念是：到底哪种文字是原文？哪种文字是译文？人们的回答可能见仁见智，但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时埃及是一个多语社会，翻译已经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

【小结与讨论】

翻译活动的直接起因是语言的隔阂，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人因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所以要通过翻译来“达其志，通其欲”；西方人则认为人类本来讲相同的语言，因为上帝担心人类修建的巴别塔威胁自己的地位而变乱人类的语言，才产生了翻译的需求。正史中与翻译相关的记载多见于外事活动，这也是翻译实用性的另一注脚。相比之下，西方人对翻译的看法则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形而上的思辨。“巴别塔”的传说不仅仅关乎翻译起源的问题。首先，它告诉我们古代西方人的翻译观，即翻译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这个观念影响深远，在当代仍然相当流行；其次，造塔与毁塔反映了人与神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立约，规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巴别塔的故事又曲折地暗示了翻译问题绝不仅仅限于言辞，还涉及权力和伦理等问题；再次，这个故事还反映了古代西方人对语言大同的理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场“世界语”（Esperanto）实验出现在

1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第754-755页。

2 同上，第734页。

3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页。

西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¹ 不过，在翻译问题等于语言问题这一点上，中西古人的看法相差不多。

中外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都十分久远，然而具体时间却很难确定。在中国如果按照《册府元龟》的说法“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推断当时就存在外交口译，那么中国在公元前 21 世纪就有翻译活动了。但这仅仅是推断，因为文献中并未直接提及翻译。真正记载翻译职官的是周代的史书，如《周礼》，从其作者周公的时代推断，中国最早关于翻译的记载当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中东地区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也十分久远，亚述帝国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就有“书吏”翻译王国诏令了。《旧约》也有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旧约》中最古老的篇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3 世纪，因此可以说巴勒斯坦地区的翻译活动可以上溯至公元前 13 世纪。古希腊的翻译活动记载不多，但古罗马的翻译活动记载很细，大致从公元前 3 世纪开始，到公元元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

然而，尽管中国有记载的翻译活动似乎早于西方，但西方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却比中国更加详细和系统。西方对翻译理论的总结不仅比中国早，也更全面。就翻译内容来说，中国先秦时期的翻译对象主要是外事活动的相关内容，译员往往是政府公务人员。西方早期的翻译内容除了宗教文献，还有大量文学、社科、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译员中学者居多。中国古代对译员十分轻视，因而很少能在史籍中发现译员的姓名和生平，而古代西方却不一样。古罗马的文学翻译家们受到无数人敬仰崇拜，他们的生平、著述和翻译作品成为历代学者研习的对象。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对译者的轻视也很严重，但往往是在与创作家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译者受到忽视甚至蔑视，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现象，这与自古以来人们仅仅把翻译理解为语言转换的技术性工作和语言工具论有莫大关系。

【思考题】

1. 早期中西翻译史有何同异之处？
2. 中国古籍中为何对翻译活动的直接记述十分稀少？

1 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4 页。